

大师的旷世之交



吴宓 (1894~1978)



陈寅恪 (1890~1969)

■滕客

吴宓与陈寅恪，是 20 世纪的两位国学大师，他们的命运长期交织，荣辱沉浮，至死不渝。他们的友谊令人感动，命运令人心酸，人格令人敬佩。

吴宓与陈寅恪是坚守民族大义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交往始于 1919 年的哈佛大

学，两人一见如故，经常相偕散步于查理士河畔。当时，吴宓惊其博学，服其卓识，并给国内朋友写信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并多次说：“陈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1925 年，吴宓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聘请陈寅恪为“导

师”。此后两人共事于清华，朝夕往还，吟诗唱和。旷世之谊，令人赞叹。

吴宓与陈寅恪的交流，不仅在学识上，还涉及处世与婚恋。吴宓的日记里多次提到陈寅恪独特的情爱观，如：“陈君寅恪云‘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云‘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陈寅恪的这一席话，对吴宓决计与陈心一结婚，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尽管这段婚姻并不长久，吴宓后来还是未能全盘接受陈寅恪的婚姻观而移情别恋，但两人一见如故的不寻常的交谊，于此可见一斑。

吴宓与陈寅恪还曾卷入了一场改换校长的风波。1927 年 7 月 18 日，陈寅恪、吴宓等教授联合发表宣言，反对清华校长违背校章，妨碍全校发展的决定。同年 11 月 10 日，在教授大会上，陈寅恪当面要求校长曹云祥辞职。陈寅恪和吴宓一向很少涉足行政俗务，然而在 1927 年的这两次风潮中他二人却颇为积极，且配合十分默契。但仔细思考，吴陈二人的本意，在于维持和营造一个较为理想的学术氛围。

吴宓与陈寅恪都有着独特的个性。就性格而言，吴宓急躁多虑而热心公益，陈寅恪则沉稳坚毅而志在自修。在抱负上，吴宓毕生怀有“斯文同骨肉”的大悲悯之

心，所言所行更偏向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立德”，以大块为文章；而陈寅恪则多洁身自好的恬淡退隐思想，侧重于著书以“立言”。然而在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所谋之“道”方面，两位大师却又是殊途同归的。

不过，他们的命运却是悲剧式的，他们的晚年逐渐落入了凄凉之境。吴宓晚年受迫害，精神大坏，据说他常大喊“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等语。回忆背诵老友陈寅恪的诗文，成了吴宓晚年的心灵慰藉之一。1973 年 6 月 3 日的吴宓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近晓 4 时 40 分再醒。适梦陈寅恪兄诵其新诗句‘隆春乍见三枝雁’，莫解其意。”而陈寅恪在“文革”一开始，就成了冲击对象。学术助手被赶走，原来照顾他的护士也被赶走。他不但目盲，而且早在 1962 年跌断了右腿腿骨，不能行走，后在折磨中去世。后人读到吴宓最后写到广州打探陈寅恪生死消息的那封信，泪欲先下。那一代学者的命运，总令人唏嘘不已。

现在感慨的是，大师已经远去。那时的他们，有知识，也更有情趣；有性格，也更讲人格和品格。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儒雅、学养、对自我的克制，以及对社会的奉献，应该千秋万代去绵延的。其实，大师与知交的交往中，有太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就交际而言，人这一辈子，有这样的旷世之交，此生还有何求？

民国时电影明星收入多少？

■陶坤

当下，电影演员是一个高收入职业，尤其是明星。民国时期，电影明星同样收入不低，但相比今时今日，一些演员的片酬动辄达到几十万甚至数百万，还是有些差距的。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电影的一个黄金时代，胡蝶则是当时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胡蝶出演的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更是令她红遍全国，被誉为民国电影皇后。那么，这位当时的最大牌影星收入如何呢？1928 年，胡蝶转入明星电影公司，拿到高达 2000 元的月薪（实际支取 1000 元，公司欠 1000

元）。月薪 2000 元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对比当时，一个上海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为 20 元左右，胡蝶的月薪足足达到工人工资的 100 倍之多，绝对称得上超级高薪了。

这还不算，作为电影明星，除了赚取月薪外，还有不菲的片酬收入。胡蝶一部电影的最高片酬达到 2000 元，也曾红极一时的阮玲玉的最高片酬是 1000 元，曾出演过《青春线》、《桃李劫》等经典影片的影星陈波儿，片酬约为 300 元每部。周璇成名后曾到香港发展，她在香港拍片的最后两年，每部电影都是以几十根金条来计算片酬的。

相比这些大牌明星们的丰厚收入，一

些刚刚出道或名气不足的小演员，收入水平则要低得多。1935 年，出道不久的周璇签约电影公司，月薪仅有 50 元，直到 1937 年她出演了电影《马路天使》后一炮而红，月薪才涨到 200 元。当时，其他演员的收入比大明星们普遍要低上一个档次，蓝苹（即江青）、秦怡等人的月薪都在 60 元左右。一些男演员稍好，例如因主演《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而走红的赵丹，月薪一度达到 200 元，而演员出身的大导演谢添当年月薪最高时为 250 元。

可以看到，民国时期电影明星们的总体收入水平不俗，虽然称不上日进斗金，但相比劳苦大众的艰辛，电影明星们已经可以过上丰衣足食的优渥生活了。

谷雨曾为植树节

■华悦

在古代，并无明文规定的植树节。

不过，植树造林毕竟是一要事。特别是桑榆，对农业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每年，多数农家种植桑榆，多选在清明前后。这个时间气候和湿度，都比较适合树木的生长，存活率也较高。

民国建立后，植树造林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意识到。所以，民国政府下令，以清明节为植树节。在这一天，各地都会举行植树活动。而民间自发的植树造林，也多选在清明前后。但这么一来，问题就出现了。

在北方，特别是靠近边塞的地区，比如东北和西北等，清明节前后并不适合植树。在这些地区，哪怕到了清明，气候也还

没回暖。寒风凛冽，土地还没解冻，很多地方甚至积雪未化。就算勉强种下去，存活率也很低。

所以，对于这些地方来说，每年清明节的植树，多是做做样子，并没有多少实际作用。后来，包括东北在内的一些省市就提出，植树节应根据各地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应拘泥于清明节这天。于是，有些地方就将植树节定在了谷雨这一天。

谷雨已经是 4 月底，哪怕是北方的边塞，天气也已经回暖，土地解冻。这时种下的树，存活率高，不像以往那么劳民伤财又一场空。正因如此，很多北方省市都陆续将谷雨这天定为植树节。而某些寒冷的北方边塞地区，更把植树节的日子再往后推，定在了 5 月 1 日。这么一来，植树才有

实际意义。

当然，这个举措也一度受阻。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接着，民国政府下令，由于植树节定在清明，也是为了纪念孙中山，意义重大，因此应该全国划一，取消区别，这样才能凸显这个日子的重大意义。

这个不切实际的命令，导致有些将植树节定在谷雨这一天的地方，不得不将其改回到清明。而在东北，因为张学良的支持，尽管东北南部也将植树节改在清明，但北部则依旧维持原状，以谷雨为清明节。

时至今日，北方多数地区的气候，比民国时暖了许多，自然不必将植树节定在谷雨。所以，谷雨这个曾经的“植树节”，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为何购物叫买“东西”不叫买“南北”

■万祥

“东西南北”本来都是表示方位的词语，为何后来“东西”又被当作物品的意思呢？

有一则小故事说“东西”代指物品，与宋朝理学家朱熹有关。

有一天朱熹在路上碰到精通五行学说的好友盛温和提着篮子，于是问道：“你去干什么啊？”

盛温和答：“去街门买东西。”朱熹愣在当场，原来当时还没有“东西”一词。他不解地问：“买‘东西’？这是什么意思？为何不买‘南北’？”

盛温和笑着说：“真不明白？你这位大学问家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把五行和五方对照一下就明白了。”

朱熹低头思考了一会，豁然开朗。

原来在五行之中，“东”即“木”，“西”为“金”，“南”属“火”，“北”乃“水”。盛温和说买“东西”，是指买金木一类的东西；“南北”指水火，是不能装在篮子里的。从那以后，“东西”一词就代指物品，流传至今。

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东西”一词的确是在古代就有了。东汉时朝，洛阳和长安是两座繁华的商业城市，洛阳被称为“东京”，长安被称为“西京”。民间有人到东京、西京购货，就称“买东”、“买西”。久而久之，“东西”便成了货物的代名词，于是买“东西”一词就流传开来。